

牡丹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牡丹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 | | |
|-----------------------|------------|---------|
| 安子反日同盟军的建立 | 李荆璞 | (1) |
| 抗联五军西征派遣队在敦化额穆地区的战迹回忆 | 李荆璞 | (13) |
| 抗联小部队的峥嵘岁月 | 李明真 | (31) |
| 特殊的战斗 | 冯淑艳 | (63) |
| “张黑子”先遣军的始末 | 焦永琦 崔联友 | (81) |
| 张宗昌在绥芬河的二年统治 | 陈梓东 | (112) |
| 下屯河娘娘庙 | 陈国礼 | (120) |
| 庙沟惨案 | 宋宪章 | (125) |

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

李荆璞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光辉灿烂的篇章！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三省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里回忆的只是一个片段，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密营——平日坡——绥宁反日同盟军的诞生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强占我国东北，东北三千五百万同胞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解救人民的倒悬之苦，东北许多有志之士，纷纷组织民众，拿起刀枪，英勇抗击侵略者。在“不愿做奴隶，不愿做牛马”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怒吼声中，东北的各种抗日组织蜂拥而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和几个雇农出身的青年好友收集了几把大刀和扎枪，我并做了一支木头盒子枪，乘日本鬼子还没占领宁安，地方上已呈现群龙无首之际，我们夺取了当地大粮户的几支枪，自发地组织起一支农民反日队伍。当时的各种队伍都有名称，因为日本鬼子是从宁安县的南面来的，就以“南洋”暗指日寇——东洋鬼子，“平南洋”就是扫平日寇的意思。“平南洋”虽然是这支部队的番号，但由于这支部队是我领导的，所以后来“平南洋”也成了我的

绰号。

“平南洋”这支队伍组织起来不久，中共宁安县委就派军事部长于洪仁同志到我的部队来工作，当时他的身份是秘密的，我并不知道。在几次战斗中和部队的发展等一些问题上，于洪仁同志向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对他很器重，我任总队长，派他当副总队长。后来，我逐渐了解了于洪仁的身份。我在于洪仁同志的帮助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决心跟共产党走，经于洪仁同志介绍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而，“平南洋”这支部队组织起来不久，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反日部队。

这支反日部队打了几次胜仗之后，一时名声大震。因此，一些小股队伍率队来投，许多散兵游勇也慕名而来。半年之内，“平南洋”总队即由几十人发展壮大到五百多人。部队迅速扩大，也带来了许多复杂问题，日本鬼子和汉奸就欺骗老百姓，骂“平南洋”是大土匪头子，妄图破坏抗日军民的关系。

我和于洪仁商量后，认为反日完全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应尽的义务，于是将部队改编为“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由于人员多了，在总队下面设立几个大队，我仍任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于洪仁同志任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并决定选择适当地方，把部队驻扎下来，对部队进行整顿。

（一）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密营——平日坡

部队要整顿，就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总是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与日本人打仗兜圈子，部队安定不下来，根本没办法整训。另一方面，从战略上考虑，日寇必然要利用东北的冬季气候条件，乘大雪封地跟踪追击我们。为了避开日寇冬

季“讨伐”的锋芒，使部队能够休整，养精蓄锐，以利再战，需要有一个比较巩固，进可攻、退又可守的根据地。经过大家研究，最后拟定部队到天桥岭修建一处密营，即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密营，供疗养伤病员和部队冬季整训用。

天桥岭位于宁安县东南，是长白山的一个支脉，是个原始大森林。这条山脉长达一、二百华里，方圆几百里，山势险峻，怪石峥嵘，林木茂密。但是，山顶上却地势平坦，是建筑密营的好地方。我亲自带领小分队对这个地方进行了认真勘察之后，就确定在这里建立密营。

一九三三年秋天，我和于洪仁同志商量之后，挑选了一些可靠的人组成一个分队去天桥岭，选了一个向阳的山坡，开始对这个密营的建筑工作。首先，他们披荆斩棘，开辟了两条仅能供单人通行的小道，以便搬运粮食和物资。接着，他们就伐树，构筑营房，建起了宿舍、仓库、修械所、缝纫所等。营房建筑全部是木泥结构，用树干做墙，以树皮和干草当瓦，用黄泥抹好。

营房建立起来以后，战士们又在营房四周设防，构筑工事。为了防备万一，还在通往密营的小道上，设立了三道严密的关卡，放了警戒哨。在小道的拐弯处，安了榆木筒子炮，这种土炮是把拧着劲长的大榆树干挖空，里面装上火药，后面安上仿造洋炮枪的炮台和机头。到了晚上，给机头挂上弦，弦的另一头连接在敌人来时可能经过的小道上，敌人若来了只要绊动这根弦，土炮就会向敌人发射。炮声很响，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杀伤和威吓；另一方面也起到给部队发出战斗警报的作用。

在建设密营的同时，还派部队从山外运进去大批粮食。在

吃、住一切都准备就绪以后，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按计划全部进入密营整训。

北湖的十一月，漫天皆白。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十分寒冷。部队进山以后，都住在新盖的大木棚子里，每个大木棚子住一个连。在大木棚里面的两头各放一个用汽油桶做成的火炉，用木柴生火取暖。

我们当年把这个掩护部队进行整训的深山老林的向阳坡，命名为“平日坡”。

（二）密营整训——按照党的建军原则建设部队

部队进入密营之后，为了加强对部队整训工作的领导，党又派张建东、朱守一两位同志来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做党的工作。为此，改组了党的支部委员会，由于洪仁、张建东、李荆璞、朱守一和王光宇五个同志组成。于洪仁任书记，张建东任副书记。

部队开始整训以前，党支部对部队的情况做了认真的、细致的全面分析和研究。认为：基本队伍是比较纯洁的，部队总的情况也是好的，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从一九三二年春天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部队从五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扩大了一倍多，这个成绩是不小的，应该充分肯定。同时，由于部队发展快，收编的零散部队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复杂成份和一些不良习气。这种情况如果不迅速改变，势必对今后部队的建设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决定按照党的建军原则整训部队，从本质上进行一次改造，迅速地改变部队目前的状况，提高部队的无产阶级素质。为此，党支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布置。

由于当时部队党的组织是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所以，确定

部队整训由党支部领导，由行政方面组织实施。整训的方式主要是思想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国内形势、部队的性质、任务、政策和纪律等。整训的方法和步骤是：首先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由我以总队长身份进行整训动员，在肯定部队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指出部队当前存在的问题，讲了部队整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后讲明了整训的目的、意义、方法和要求。接着，由副总队长于洪仁同志作报告，阐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

在整训期间，全体党员按照党支部的要求，利用空余时间采取各种形式，把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向他们宣传反日救国的道理，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向他们进一步讲明取消旧制度、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性，说明私有制是剥削阶级压迫穷人的枷锁，应该废除；官长打骂士兵是旧军队中长官欺压士兵的军阀作风的表现，我们反日部队应该实行官兵平等。

在组织士兵讨论时，有意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或思考。如让大家根据部队当时实际情况讨论：打仗时大家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物质和钱财等作为官长的私有财产租给下级使用，定期交租金对不对？长官打骂士兵，乱施肉刑，甚至杀害人命，怎么办？启发官兵觉悟。

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训，经过由浅入深，从原则到具体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绝大多数官兵对取消旧制度，改变不良习气和作风，建立新秩序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的民主空气比过去浓了，官兵关系比过去好了，抗日的热情、斗志更旺盛了。党支部研究认为，这次整训已经达到目的，决定让我以总队长身份，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作部队

整训总结发言。总结之后宣布：部队从今天起，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各个大队、中队没有命令不得随便行动；第二、废除私有制度，一切武器弹药、物资归为公有；第三、废除肉刑，禁止官长打骂士兵，官兵一律平等；第四、过去的事，概不追究，从现在起建立新的秩序。希望全体官兵认真遵照执行。

我的总结讲话，受到了大多数人的热烈欢迎。战士们拥护说：“早就盼望这样了！”但是，由于这一“决定”触动了某些少数人的私利，宣布之后，立即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于是拥护与反对的双方当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结果还是绝大多数人拥护，少数人反对。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这个决定。

这场斗争既尖锐又复杂，总结大会结束以后的当天晚上，就有几个小队的头目带着队伍逃跑了。同时，还发现有两个队长正在密谋杀害我和于洪仁同志后，拉队伍叛变。党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抢在他们预谋动手之前。以有重要情况为名，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在会议中，出其不意地解除了这两个坏头目的武装。接着，又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我在会上向大家宣布为什么逮捕这两个人，并公布了他们阴谋杀害领导与叛变的罪证。同时，发动官兵深入揭发这两个坏头目的罪行。从大家揭发的情况看，这两个人不仅有现行的罪行，而且历史上是一个有血债、罪行累累的土匪头子。根据他们的罪行，以及广大官兵的要求，进一步严肃军纪、平息民愤，教育全体官兵和稳定部队，把这两个坏头目枪毙了。对参与阴谋活动，准备和这两个坏头目一起叛变的几个罪恶较小的人，根据他们的情况一律开除出队。对刚从

旧部队收编过来的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守纪律、年岁较大、身体不好、过不惯部队艰苦生活的人，我们决定动员他们离开部队，回家另谋生路。通过与他们个别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本人愿意就走，不愿意就暂时留下，继续做工作，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离开部队，采取个别遣送。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陆续将这批人清除了部队。在他们离开部队时，部队组织欢送，发给路费，并希望他们回家当个好老百姓，有条件时，继续给反日部队有力支持。我们对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做得比较细致，道理也讲得充分而又合乎情理，所以，这批人大部分走得比较愉快，继续留在部队的人也比较安心，并逐渐克服了旧习气。这样做，起到了纯洁、巩固部队和提高战斗力的作用。

最后，由于洪仁同志向全体官兵作了《关于整顿纪律、作风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后，宣读了总队司令部拟定的《关于加强部队纪律、实行官兵平等的规定》。

这次密营整训，党的建军原则初步得到贯彻，党在部队中的威信有了进一步提高，党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也经常化起来，官兵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内部团结有了加强，思想政治觉悟日益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日益加强，为这支部队坚持以后十多年的艰苦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绥宁反日同盟军的诞生

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在“平日坡”密营整训快结束时，吉东特委派胡仁同志来到平日坡，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当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接到周保中通过吉东特委秘密交通员送来的一封信。周保中在信中说：根据吉东特委决定，他将

率领边区军来与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会师。过了几天，我们又接到吉东特委的指示：周保中是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他不久将率队来宁安与你们的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归周保中同志统一指挥，并要做好迎接周保中同志率领的边区军的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吉东特委的指示，党支部专门做了研究，做了和边区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山探听周保中同志到来的消息。

一九三四年二月初的一天，派出去的同志回来报告：周保中率领的边区军部队，已经到了离平日坡三十里的牛家屯。我和于洪仁同志带领十多个同志立即下山去迎接。在山下大磨头沟屯迎到周保中同志，周保中和我们一一握手。周保中同志和我们商量后，把带来的边区军一、三连暂时安排在大磨头沟屯休息，周保中同志带着十来个人和我们连夜上山去平日坡密营。由于山路夜间难行，直到下半夜才到达密营。

在密营的张健东同志等听到哨兵报告——周保中同志和总队领导已经快进八密营了，他们就立即组织部队准备迎接。当周保中一行来到第一道卡子营房时，受到了密营部队的热烈迎接和接待。张健东和于洪仁同志急忙上前同周保中同志紧紧握手，互相问候。

周保中同志到密营稍事休息，就开始工作，他首先听取了我和于洪仁同志关于密营和部队情况的汇报以后，又逐个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周保中同志又对当前形势和今后部队建设的打算，同干部一一交换看法，听取意见，并同于洪仁和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从

各自的身世、经历，谈到当前的情况；从救国军的失败，谈到今后部队建设的打算；从日寇灭亡中国的野心，谈到中国反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反日斗争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谈到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从党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谈到如何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周保中同志说，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党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反日同盟军，拖住鬼子的后腿，要拖住它，使它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况且，东北的反日部队的确不少，有溃散的救国军的残部，有打着反日旗号的各个山林队等，就是力量不集中，不能给日寇以有力打击。看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号不行。你们看是不是先把我们这两支部队合起来，以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为基础，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在同盟军这面旗帜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来团结各部队，建立和扩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军队。周保中同志又继续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们先考虑一下，不作定论，等听取有关干部意见后，我们专门开会研究。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谈话，使我久久难忘。

经过充分酝酿、准备之后，周保中同志首先召开了领导干部的“五人会议”，讨论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五个人是：周保中、张建东、胡仁、于洪仁和李荆璞。会议一开始，周保中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我们的会议，就是讨论决定一个问题：看是否可以成立反日同盟军？接着，大家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两支部队联合起来，由周保中同志统一指挥，这是吉东特委的指示，大家都表示一致拥护。但是否要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问题，开始是有争议的。于洪仁同志等主张成立反日义勇军。对这个

意见，开始张建东同志也是表示支持的。大家觉得“同盟军”和谁同盟呢？即使同盟了也不是统一建制，不好领导……。会议正在讨论过程中，侦察员来报告说：住在大磨头沟屯的边区军已经开走了，去向不明。他们开走，也没有请示周保中同志，因而，实际上是不辞而别。周保中耐心地说服大家，边区军开走啦，我们也一定要成立同盟军。他针对不同意见说：“义勇军”这个名称一般的反日部队用得太多，全国统称东北各个抗日军队为义勇军。这个名称不能广泛地团结同盟者，我们只有根据党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结合我们当前的情况，树起一面同盟军的旗帜，才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逐步联合反日队伍，扩大反日力量。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同盟者，不等于永远没有同盟者；在我们同盟军的旗帜下，一定会联合越来越多的同盟者。随着同盟者的增加，最后我们必将把日寇从中国驱逐出去。在周保中同志的耐心说服下，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决定由周保中同志任军长，张建东任军参谋长，胡仁任军政治部主任。军以下实行三三制，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团。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改编为一师一团。我任一师师长，兼一团团长，于洪仁同志任一师政治部主任，兼一团副团长。其余编制暂缺。

领导干部会议确定成立同盟军后，就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这次党员、干部大会的主要议题有四个：第一、传达贯彻关于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决议和成立同盟军的方案；第二、选举中共绥宁反日同盟军委员会；第三、研究同盟军办事机构的设置问题；第四，研究同盟军成立后的形势和任

务。

关于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决议和方案传达以后，得到全体党员、干部的一致拥护。会议研究了具体贯彻办法，主要是如何做好思想工作，保证成立反日同盟军的决议的贯彻执行。同时，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军党委，选举周保中、张建东、胡仁、于洪仁、李荆璞五位同志为军党委委员，周保中为军党委书记。

与此同时，成立了同盟军办事处，并由周保中军长兼办事处主任。因为，周保中军长原来在王德林的救国军中担任过前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救国军各个残部和山林队中有很高威望和影响。所以，由周军长自兼同盟军办事处主任，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收容分散的救国军残部和各反日山林队，扩大同盟军。

会议还讨论了形势和任务，根据当时的形势，会议确定要加强对部队中的党的建设，积极发展党员；做好巩固和发展部队的工作；扩大游击区。

在会议结束的总结大会上，军党委五名领导都讲了话。与会同志一致表示：今后在军党委和周保中同志的指挥下，积极作战，争取多消灭敌人，为东北三千五百万同胞抗战，为把日寇驱逐出中国而斗争到底！

这次会议在东北抗日战争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它决定成立了绥宁反日同盟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诞生的一块奠基石。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同盟者就纷纷来办事处和我们联系，有的带队来参加我们同盟军。第一个带队来的是王毓峰，他的部队被编为第一师第二团，王毓峰任团长。第二个带队来的是傅景明（绰号古

中华），他的部队被编为第二师，傅显明任师长。第三个带
队来的是姜子荣（绰号爱民），他的部队被编为一个团，姜
子荣任团长。第四个带部队来的是王汝起，他的部队被编为我
们第一师第三团，王汝起任团长。后来，还听说史忠恒的部
队参加我们同盟军，被编为第三师，史忠恒任师长。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部队发展很快，后来又以此为
基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这一事实说明成立绥宁反
日同盟军是完全正确的，它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回忆这段历
史，我更加缅怀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创立者——周保中同志！

抗联五军西征派遣队 在敦化额穆地区的战迹回忆

李荆璞

南湖头会议

一九三四年冬，石门子歼灭战之后，我到宁安南山子找到了我们抗联五军军部，会见了周保中军长。我向周军长汇报了我们一师的一、二团在一九三四年冬天活动的情况……。待我们汇报工作之后，周军长向我传达了上级党委的指示。周军长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今后部队活动的方针是，‘保存实力，稳步发展，突破封锁，扩大游击区’”。一九三五年的抗日斗争，将比前几年更为艰苦，鬼子不断地增加兵力，而国民党政府仍在步步让步，这一切对我们都是不利的。你回部队后，就召集各团党员干部开会，总结经验，并要成立师党委，扩大党组织，增强党的作用。现在不把大的问题确定下来，以后再找机会就不容易了。”

我回到师部后，就带领一师一、二团部队向穆棱、敦化两县一带进发，到镜泊湖南端与在南湖头一营活动的王效臣团长带领的三团主力会合了。我便决定在南湖头丹东沟电把部队驻扎下来，召开我们一师的第一次师党团员、干部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周保中军长对我军一师的指示，然后分

析了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是：敌人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向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军事上，敌人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一旦发现我们，就用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来追击抗联部队。敌人派出许多探子侦察我军踪迹，还经常派出许多日伪军搜山。敌人针对我军打游击战的特点，也采取了“分进合击，跟踪包抄”的办法。日、伪军分成几路，从四面向我军袭来，几乎所有的居民点都成了敌人的据点。敌人妄图把抗日军民分割开，使抗联部队的军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政治上，日寇加紧反动宣传，搞一些自欺欺人的奴化教育，胡说什么日本到满洲来是帮助满洲人建立“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什么“日满一德一心”等等，妄想使我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姊妹做日寇铁蹄蹂躏下的顺民。在经济上，敌人从一九三三年冬就已经开始执行囚笼政策，现在又实行了归屯，在归屯的同时，鬼子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抗日部队无吃无穿，得不到休息。即使在城镇中，衣服，一个人只准买一套；鞋，一个人只准买一双；棉花，一个人只准买一斤。因而部队的棉衣很难解决。敌人想利用北满的严寒气候来把抗日部队冻死、困死。

与会的同志就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贯彻周军长的指示进行了讨论。经过几天几夜的热烈讨论，研究了游击战术原则，分析了伪军情况，并提出了不少好的办法。

在会议中，根据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作战经验，在战术问题上确定了“五打、五不打”的战术原则。就是：一打伏击仗，不打遭遇仗；二打敌人弱点仗，不打攻坚战；三打技巧仗，不打硬拚仗；四打便宜仗，不打消耗仗；五打了解敌情仗，不打盲目仗。这一切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总结出来。总司令开会时有赵其中军长传达的王经南表示的“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在有利的条件下稳步发展”。

同志们对伪军的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决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瓦解敌人。把伪军分成四种，确定了如下的分别对待的方法：第一种是保安队特务，他们多数是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当走狗的汉奸特务，对于他们必须坚决打击，毫不留情。第二种是靖安军，其袖口镶红边，群众称之为“红袖头”。靖安军是日军在辽宁新建立起来的，师长以上军官全是日本人，当兵的绝大多数是强征“国兵”征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完全没有作战经验，也不能吃苦。根据靖安军的情况，会议决定加强对他们的宣传工作，宣传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争取他们不要向日本人透露我军的行动。第三种伪军是警备旅，大多数是原东北军的官兵和一些土匪，比较复杂。这些人中有的过去是抗日的，有些人是上匪大烟鬼，光想捞钱，前两年他们有过几次起义。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从他们那里获取子弹情报，使他们不和我军打仗，条件成熟时鼓动他们反正。第四种是保甲团、壮丁队，是敌人把乡村中的青年组织起来专门对抗我们的。因为乡村离城较远，日寇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再加上我军在乡村很活跃，这种伪军是比较容易争取和利用的。通过他们，我军不仅能够弄到粮食、军械，而且部队还可以找到住宿的地方。我们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口号，主要是针对后三种伪军的下层官兵提出来的，起到了孤立日寇和汉奸的作用，为抗联部队提供了许多方便。

我作了总结发言，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确定了四项具体任务：一是扩大游击区域，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东北